

異鄉來的她

——憶第一次器官捐贈個案

文 / 黃靖玲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社會服務室社工

十月，秋冬天氣轉涼的開始；而自從來到醫院工作之後，十月，開始在我的生命裡有著不同的意義。

在醫院的社工都會為不同病症的病人舉辦病友會，透過衛生教育以及病人彼此間的支持來相互鼓勵。負責器官移植領域的我，在十月，與小組成員們辦著「特別」的病友會，因為這個病友會不僅僅是為了病人，更是為了家屬，我們稱之為「感恩追思音樂會」。

而今年十月的追思音樂會，更藉著人醫會年會的機緣，擴大成為「永恆的感恩」音樂會，除了器官捐贈者與家屬，

還同時感恩大體捐贈以及病理捐贈者與家屬。看著臺上音樂劇演出一位位無私菩薩的故事，在臺下家屬以及與會人員的淚水中，我不禁想到了她……

年輕隕落的生命 異國籍的偉大母親

她，是我至今最了解其家庭背景的「外國人」，因為她來自越南，有兩個可愛的孩子，還有疼惜她的先生以及臺灣的家人……，如此了解，但我卻沒有和她交談過任何一句話。她是阿春。

清楚記得，那一天，從臺北返回花

蓮的火車上，帶我入門的社工學姊一路忙著跟人在花蓮的器官移植中心協調護理師明蕙保持聯繫，來來回回不



● 看著眼前的死別場景，勸募器官與移植的職責讓社工與團隊人員盡可能將個人的情緒抽離，專注於為病人完成心願，而適時照顧好家屬的心。攝影 / 謝自富



慈濟醫療志工給予器官捐贈者深深地祝福，也安慰陪伴惶然失措的家屬安定心神。攝影／劉明縵

官，似乎為這個捐贈大願添了一股助力。接下來，就靠阿春自己了。

處理的過程中知道阿春出車禍時還載著三歲的大兒子，我心裡想：「慘了，媽媽傷得這麼嚴重，那孩

子的情況豈不……？」大家去兒科病房探望過阿春的孩子，才放心；原來車禍發生當下，阿春用自己的身體護著孩子，才讓孩子僅有手部神經受傷，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到此，我更為阿春母性的偉大感到折服

下十通電話，全是為了阿春。她突然發生車禍導致腦死，先生簽立了器官捐贈同意書，要為她完成遺愛人間的心願。在一旁聽著，我的心裡沒有第一次要處理器官捐贈個案的興奮感，卻為著才二十二歲人生就要結束的不捨心疼，和即將要面對腦死者的惶措不安。

原來，擔憂不安是多餘的。躺在加護病房的阿春，面容安祥，膚色紅潤，幾乎沒有外傷，只是沉沉的睡著，不發一語。學姊告訴我，要我上前認識阿春，跟她說說話。我腦袋一片空白，想著我能跟眼前這靜靜沉睡的女子說什麼時，聽到學姊已經在對阿春說：「雖然先生幫妳簽了同意書，但妳還是可以為自己的身體做決定，如果妳決定不捐，我們也會幫忙妳跟家人到最後。如果決定要護持先生的想法，要記得好好保護身體。」不久隨即接到當天在醫院值班的社工來電告知，花蓮地院檢察官認定阿春雖為外籍配偶，但依舊可以捐贈器

事情告一段落，回到家已是凌晨一點了。上班滿一個月的這天，一向好睡的我卻遲遲不能睡去，一點半，接到明蕙從醫院打來電話，告知阿春可能不能捐了，因為她血液中氧氣濃度不足。聽到這個消息，心裡給阿春送出深深的祝福，接著一夜輾轉反側，好不容易熬到早上，到了醫院，明蕙又告訴我，經過這一夜，阿春的血氧濃度已符合標準，已經在七點半通過第一次腦死判定，預定在四個小時後進行第二次腦死判定。這種感覺，好像冥冥中阿春聽到了我們對她說的話，她正在為自己的身體做出決定。

因為她是在外地出車禍，我又是一個

初次處理的新手社工，再加上也是第一次處理這種狀況的檢察官跟一個剛調回花蓮的書記官，一群「全新」的組合，增加了聯繫狀況的複雜度，幸好順利的第二次腦判後，檢察官完成相驗程序。

彷彿生日禮物 先生也要捐自己

下午兩點鐘，外科加護病房團隊、移植小組將阿春推進開刀房，三點十五分開刀房通知，臺大的團隊剛剛摘除心臟，阿春已經去當菩薩了……。恍然中發現，怎麼這麼巧，早上才看到阿春先生的身分證件，今天，是她先生的生日。後來我們也寫了一封代替生日卡片的信，希望給阿春的先生打打氣。

而在先生簽完阿春的器官捐贈同意書後，又來找我，因為他要簽自己的器官捐贈卡。我問他：「你才剛簽完太太的同意書，怎麼會選在這麼『特別』的時刻簽自己的？」他笑著說：「沒有啦！我想說如果我只簽阿春的器捐卡，我怕『下去』後會被她怪說為什麼只把她捐出去，自己卻很自私沒有捐。」說笑的當下，先生的眼中其實是閃著淚光。

晚上八點半，花蓮區的志工在助念堂完成八小時的接力助念後，器官摘除已將完成，準備將阿春送出開刀房，我們隨即到樓下請先生上來接她。在等待中，先生娓娓說出他們的故事；結縭四載，他們生了兩個孩子，因為先生從事養殖工作，常常很晚回家，已睡的阿春仍舊起床為他煮宵夜，且專心操持家務帶小孩，讓他無後顧之憂。回憶從前的

先生，臉上總有股靦腆的笑。寶彩師姑突然開口問他：你現在心情怎麼樣？原來談笑風生的他愣了一下悠悠地說：

「以後晚上再也沒有人幫我煮宵夜，在我熟睡時也沒有人替小孩蓋被了……」說完，兩行清淚從他黝黑的臉上滑落。只專注著圓妻子的願，在這完成的一刻，先生忍住許久的悲傷終於潰堤，我們陪伴著他，而我也忍不住流下我忍了已久的眼淚。

半年過後，有一天阿春的先生帶一位年長女士來辦公室找我，原來是阿春的媽媽；媽媽牽著我的手，說著我聽不懂的話，但我看到她的笑、她的淚，阿春的先生告訴我，當時媽媽雖然捨不得，但還是讓女兒去救人了，媽媽覺得女兒能在遙遠的國度助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所以來到臺灣無論如何也要來看看當時陪伴阿春的我們。

這是我的第一個服務器官捐贈的個案，因為最初，所以印象格外鮮明，因為最初，所以震撼最大。

每出現一例器官捐贈，代表著一個生命的殞落。這幾年來，我曾經想過我何德何能為這樣的大捨菩薩服務，陪他們走人生的最後一段；一位器捐家屬的一句話肯定了我的工作價值，他告訴我：「還好有你的陪伴，不然在他生命的最後，家人陷入慌亂，什麼都無法幫他做！」生命消逝的必然，因為捐贈器官而有延續的希望，才讓我願意繼續在這生命與死亡交界的衝突中奔忙。

